

现代中国

第十五辑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(CSSCI) 来源集刊

现代中国

第十五辑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现代中国·第15辑/陈平原主编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4.7

ISBN 978-7-301-24410-4

I. ①现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社会科学-文集 IV. ①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35959 号

书 名: 现代中国·第十五辑

著作责任者: 陈平原 主编

责任编辑: 艾 英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301-24410-4/G·3838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pup.cn> 新浪官方微博:@北京大学出版社

电 子 信 箱: pkuwsz@126.com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
编辑部 62756467

印 刷 者: 北京大学印刷厂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965 毫米×1300 毫米 16 开本 19.5 印张 398 千字

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5.00 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-62752024 **电子信箱:** fd@pup.pku.edu.cn



第十五辑

目 录

论文

满汉关系的逆转

——贵林被杀事件解读 夏晓虹(1)

章太炎语言文字论说体系中的历史民族 王 风(33)

文字难易与教育新旧

——戊戌前后蒙学变革论的语文侧面 陆 胤(66)

鲁迅早年对科学僭越的“时代病”之预感 温儒敏(98)

如何化解儒学传统与现代社会对峙

——李大钊“青春”人生论的解读 胡 军(104)

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傅斯年

——《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·傅斯年卷》导言 欧阳哲生(117)

告别奥尼尔:洪深30年代的转向 吴晓东(141)

在“文学史著”与“出版工程”之间

——《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》导读 陈平原(147)

我爱这土地

——中国新诗1937—1948 谢 冕(178)

“诗界革命”与新诗发生期研究的突破性思考

——序荣光启《现代汉诗的发生:晚清至五四》 孙玉石(218)

纪念三位诗人 洪子诚(229)

遥远的乌托邦

——王安忆《弟兄们》中的女同志连续体 滨田麻矢(243)

满汉关系的逆转 ——贵林被杀事件解读

夏晓虹

今人已少有知道贵林其人姓名者，但在晚清的杭州，贵林称得上是风云人物。贵林，姓毕噜氏，字翰香，号中权，满洲杭州驻防正红旗人，官协领，辛亥革命后迅即被杀。在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之际，贵林以一员满族武官，处身风口浪尖，既与众多新学人士交往，参办各项新政，也因其满人身份与立场，同地方精英不谐以致冲突。而其最后的死亡，则可被视为辛亥前后满汉关系逆转的标志性事件。

“清朝孔子”

在杭州驻防营中，贵林属于为数不多的与汉族新学界人士关系密切的满人。《清史稿》为贵林所写的传记极其简短，但不过一百字中，却专有一笔记其“与浙人士游，有贤名”^①，可知其为人处世之特出。

详细考察贵林的交往史，一时难于做到。不过，若追溯其间的渊源，浙江平阳人宋恕（1862—1910）无疑最为重要。宋恕原名存礼，字燕生，改名后字平子，晚年又改称宋衡。其一生虽未显达，但因幼年以“神童”之誉受到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锵鸣的赏识，招为东床快婿，而孙又为李鸿章中进士的房师，故也承继到一份相当可观的人脉。孙家本为文化世家，锵鸣之兄衣言亦曾任侍讲学士，衣言子诒让更是著名的经学大家。宋恕随孙氏诸人受学、从游，旧学既有坚实根底，在时事的刺激下，又究心西学，1892年完成初稿的《六字课斋卑议》已提出系统的变法思想。其在浙江学界的重要事迹，一为曾任1897年创办的《经世报》主笔，一为1901年就任杭州

^① 《贵林传》，赵尔巽等：《清史稿》列传二百八十三《忠义十》，第45册第13722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年。

求是书院汉文总教习^①，以此广有影响。

贵林曾以“亦师亦友”概括其与宋恕的关系。二人结识大致在1889年，当年，宋恕为贵林写过《援溺说赠毕噜翰香》一文。故1910年宋氏病歿，贵林所作挽联有“交情逾廿载”^②之句。其时，贵林属驻防正白旗，为杭州将军幕府笔帖式。宋恕对其“内行纯笃而好学特至，守孔子之戒而亦不嫚骂二氏，究我国之病而渐知折服西人”^③已留下很深印象。

随着交往日密，宋恕对贵林的评价也日高。1897年，八年前尚以“生长八旗而能自拔，尤为艰苦卓绝”^④为赞辞，至此已因与贵林的交往，而彻底改变了对满人的看法：“世谓八旗人物不如汉族，岂信然哉？岂信然哉！夫八旗之不如汉族者特文学耳。若其谋略之沉雄、武力之震耀、气类之固结、风俗之近质，则汉族宁可与之同年而语耶？”开篇的这段议论，最终落实在“以恕所知，虎林数里之营而有奇士二焉：曰贵林，曰多庆”。而其笔下的贵林俨然已有圣人气象：

贵林者，目不邪视，耳不邪听，于母极孝，于兄极弟，于师友极笃，营中男女至目为今孔子。及其谈百氏、论时务，则达儒墨之要、洞欧亚之故，了然于姚江、习斋之说，昭然于言游、孟舆之传。^⑤

从中可见贵林服膺儒学之诚笃。而所取别号“慎独子”，也正体现了其知行合一之注重修行践履功夫。

1905年，在为贵林的演说集作序时，宋恕又补充说明了贵林“少孤，孝于母，弟于兄”的家庭情况，而对于“笃于师友”，则举例为：“师黄汝霖，燕人也，独客杭死，岁墓祭。”并列述了自身体验：“辛丑（按：1901年）之冬，衡病于杭，五旬乃起。君居隔数里，无旷风雪，日徒行来视。”^⑥如据日记及书信，宋恕不仅于1902年曾一度移居贵林家两月以养病，而且早在1893年10月生病之际，贵林虽不在家，其母也再三叫宋“移寓渠处以便调养”，“见待十分殷勤”。因此，离开贵家前，宋恕专门置备了“如子帖”，请贵林转呈其母。^⑦也即是说，在贵林一方的师友之道外，宋恕对贵林也有一份兄弟情谊。加之对贵林“洞晓时务，然宦情特淡”的揄扬，宋恕借“杭

① 参见胡珠生：《宋恕年谱》，氏编《宋恕集》下册，第1085—1131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3年。

② 附录二《〈宋征君哀挽录〉挽诗挽联选》，陈虬、宋恕、陈黻宸撰，胡珠生编：《东瓯三先生集补编》，第144页，上海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2005年。

③ 宋恕：《援溺说赠毕噜翰香》，《宋恕集》上册，第193页。

④ 同上。

⑤ 宋恕：《书宗室伯福君（寿富）〈知耻学会叙〉后》，原刊《经世报》第8册，1897年10月；录自《宋恕集》上册，第278—279页。标点有改动。以下凡此不再注。

⑥ 宋恕：《中权居士协和讲堂〈演说初录〉叙》，《宋恕集》上册，第364页。

⑦ 宋恕：《壬寅日记》、《致孙季穆书》，《宋恕集》下册，第947—956、682页。

防中人至有目君为清朝孔子者”^①之言,表达的正是其体己的感受。

不仅在为贵林撰写的文字中有此类言说,宋恕也照样向友朋辈鼓吹。久居沪上的钱塘名士孙宝瑄(1874—1924,李瀚章女婿,兄孙宝琦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),即是从宋恕口中初次听说贵林其人:

杭州旗营满人贵林者,字翰香,磊落有高志,识超绝,持躬严正,旗营中推称清朝孔夫子。梅青书院,满学校也,例将军委人主教,厚其廩。会令贵任之,贵不可,曰:师严则道尊,主教宜敦聘,否则不就。将军从之。贵于是大展其志,规模宏整,教弟子以王阳明、颜习斋之学,聚书并收买译报及新学图史,令纵观。不逾年,凡出其门者,人人翹异。^②

可见宋恕对于贵林,实乃真心推服。而孙氏还乡,亲自拜访贵林,感觉也一如宋氏之“惊艳”：“其人醇朴,雅识踔远,为汉人所罕见。谭时局,相对歔叹而已。贵近充佐领,所属旗丁五十人,每月三日相聚,申平等之约,坐以齿许[叙],逞所欲言,此亦创破格之事,果非常人也。”^③而做出此类行事的贵林,其特立独行可见一斑。

尤令孙宝瑄佩服的还在贵林的议论精妙与志向宏大。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两个月,贵林仍在向孙氏表达其对议会制度的向往:“翰香亦主持开议院者,谓议院为根本,根本不立,枝叶不可为。又云议院公举之意,小行之有小益,大行之有大益。”^④这样的识断不仅具有前瞻性,更需要胆量与气魄。与宋恕的常与贵林通讯^⑤、会面不同,偶尔一见的孙氏,对贵林的识见进步之速大为惊叹。其1907年日记中曾详述与贵林重晤情形:

杭城驻防营佐领贵公翰香至,余甚惊。比见,貌犹两年前;所学猛进,于大乘界中已得初登欢喜地,视天下无一非可怜者。惟静觉己身日日欢喜,虽明日缚赴东市处斩,犹是欢喜无量。彼固进国民主义而为众生主义,日以救苦拯难为愿力。

如此气魄,已令孙氏倾倒之至,甚至说:“余仰视之,犹见大士云中坐也。”^⑥以观音

① 宋恕:《中权居士协和讲堂〈演说初录〉叙》,《宋恕集》上册,第364页。

② 孙宝瑄戊戌二月初五(1898年2月25日)日记,《忘山庐日记》上册,第176页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3年。

③ 孙宝瑄戊戌四月十八日(1898年6月6日)日记,《忘山庐日记》上册,第209页。

④ 孙宝瑄戊戌十月初七日(1898年11月20日)日记,《忘山庐日记》上册,第274页。

⑤ 至今尚存留宋恕致贵林三信以及贵林致宋恕二信(分见《宋恕集》及《东甌三先生集补编·〈宋恕集〉补编》)。

⑥ 孙宝瑄丁未四月十八日(1907年5月29日)日记,《忘山庐日记》下册,第1030页。标点有调整。以下凡此不再注。

菩萨比拟贵林,对于眼界颇高、自负善“说理”为平生“三绝”之一^①的孙宝瑄,实为难得的评价。

凭借对师友的笃厚、个人英气的发露以及口耳相传(特别是宋恕的称扬)建立起来的口碑,贵林在浙江新学界也广有人缘。与宋恕为至交的陈黻宸(字介石)^②,应该也是通过宋恕而结交了贵林。即使1904年担任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会长的蔡元培,于1901—1902年与贵林的交往中,对其也多有赞誉。蔡之认识贵林,乃是由陈黻宸。1902年2月,宋恕因“病丹毒,卧床二十日矣”,蔡元培前往探望,对贵林“日视之,友谊之挚,可敬”^③亦深为感动。而蔡氏1902年西历新年在杭州与黄世振结婚时,所邀一千朋友中便包括了贵林,也证明彼时蔡对其人颇有好感。

贵林还有一项杰出的才能为“善演说”,亦以此而为大众知晓。宋恕尝记其“于协和讲堂陈医国之道,洋洋数万言”,“听众数百人,诸学校师徒盖居多数”。而贵林“神不少怯,从容尽意,洪钟之声,耳根毕达,首尾完全,胜任愉快”,以至听众竞相赞叹:“真演说家矣!”^④即使与贵林交往不多的孙宝瑄,于此也深有感受,至谓:

彼(按:指贵林)为今日我国演说大家,能悲人喜人。惠兴女学校,彼为监督……自杭州来时,与女校生别曰:我此行虽两匝月,视尔等不能释然。女生皆大哭曰:先生行矣!我辈谨守法,以待先生之归。其感人如此。^⑤

甚至对贵林并无好感之人,讥刺其“雅好沽名”,却也承认贵林“善演说,每有公益等事,贵则必到,每到必放声演说,闻者惊叹”。^⑥于是,在蔡元培“以演说代闹房”的别开生面的结婚仪式上,贵林即秉持其一贯作风,当仁不让,率先演讲。^⑦而演说本为晚清兴起的一种启蒙大众的有效方式,这也成为贵林之为新人物的一大标记。

① 孙宝瑄辛丑十一月二日(1901年12月12日)日记,《忘山庐日记》上册,第437页。

② 宋恕《六字课斋津谈·词章类第十二》:“计飘零十载,得知己之最三焉:……怀抱知己以陈介石孝廉为最。”(《宋恕集》上册,第92—93页)

③ 蔡元培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(1902年2月4日)日记,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:《蔡元培全集》第15卷,第373页,杭州:浙江教育出版社,1998年。另,同年三月朔(1901年4月19日)日记有“介石同湖州人贵林君(字翰香)来”(《蔡元培全集》第15卷,第330页)的记述。

④ 宋恕:《中权居士协和讲堂〈演说初录〉叙》,《宋恕集》上册,第364页。

⑤ 孙宝瑄丁未四月十八日(1907年5月29日)日记,《忘山庐日记》下册,第1030页。

⑥ 《看旗营第一人才》,《民立报》1910年12月3日。此条材料由黄湘金博士提供,特此致谢。

⑦ 蔡元培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(1902年1月1日)日记,《蔡元培全集》第15卷,第371页。

身为驻防营长官,贵林习武乃是当行本色^①。而其个人的期望显然更在文武双全,故于作文、读书上相当用功。1892年4月致宋恕信中,贵林便汇报,自“前年秋”起,“月做文三篇,皆未尝间断,后又学做时文数篇”。^②这未必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预做准备,而更多属于一种兴趣爱好。虽然努力求进,文学表达能力的提升却是慢功夫。因此,时人议论贵林:“惜与文字一道,不甚通达,实为此公之缺点。”^③即为前述宋恕善意的说法“八旗之不如汉族者特文学耳”的直白表达。谊兼师友的宋恕,因此也曾义不容辞地为贵林改文章^④。

至于读书,贵林则是中西并进。如1891年秋后,半年以来,“只看《朱子古文》及《理学宗传》诸书”,又于理学修身上“得益不少”^⑤,很符合贵林以孔孟之道为根本的治学路数。而其读西书,也受到了宋恕的指点。1895年致贵林信中,宋恕一再推荐各种西学新书:“经济之学愈多看西书愈妙,日本人所著《万国史记》不可不细看一过,并宜广劝朋友、门生读之!此书于地球万国古今政教源流,言之极有条理,我国人所不能为也。”“现又有一部极好新书,名《泰西新史揽要》,系西士李提君所译,急宜买读也。”“各教宗派或有专书,或未有,或虽有而未译未见。就弟所过目者言之,莫如西士所译之《古教汇参》,不可不读!”^⑥其中不乏应贵林之请而开具的书目。贵林果然也认真研读,以至1902年阅读梁启超于日本所办的《新民丛报》时,认为梁“推尊西儒过甚”,故“意欲博考西儒全集,择抄其精要之语,与我汉宋诸儒精要语录并抄,合为一集”^⑦,愿力亦不可谓不宏大。而最重要的是,其间明显透露出贵林的学术取向趋新而不废旧,根基仍植于传统的汉、宋学。

大体而言,在晚清学术分野中,如贵林一般,早在1889年即能“究我国之病而渐知折服西人”,即使在汉族知识精英中亦不多见,其思想超前应无疑问。而其人之笃信儒学,律己甚严,则难免高标绝世,苛责于人;扬才露己,高调做事,则易招来嫉恨;擅长并喜欢演说,又可能言多必失或者言多贾祸,在富有感染力与煽动性的同时,未尝不因杀伤论敌而埋下祸根。最后,其出身满人所葆有的强悍与直率,作为性格底色,也使其爱憎表达得格外分明;同样,周边人对他也是爱之欲其生、恶之欲其死。这样一位“清朝孔子”“八旗人物”,其生命形态确实相当精彩。

① 贵林《致宋恕书》(1892年4月11日)中提及:“现在本营出有防御一缺,月内大约必要挑放,是以弟现于文课暂停,时用武功。”(《东瓯三先生集补编》,第272页)

② 贵林:《致宋恕书》(1892年4月11日),《东瓯三先生集补编》,第271页。

③ 《看旗营第一人才》。

④ 如宋恕《丙午日记》三月初五日(1906年3月29日)有“改翰香五联信”(《宋恕集》下册,第966页)之言。

⑤ 贵林:《致宋燕生书》(1892年4月11日),《东瓯三先生集补编》,第272页。

⑥ 宋恕:《致贵翰香书》(1895年7月、1895年10月3—8日),《宋恕集》上册,第535、539页。

⑦ 贵林:《致宋燕生书》(1902年9月18日),《东瓯三先生集补编》,第273页。

“旗营第一人才”

贵林先后担任过佐领与协领,无论哪一种职位,所管事务都限于驻防营之军事与政务。但他显然对此并不满足,于是,在浙江多项新政及社会团体中,都活跃着他的身影,并最终获得了旗营民意代表的资格。

尽管早在1889年,贵林已与宋恕建立友谊,1891年以前已经认识陈黻宸^①,不过,贵林之真正出名,广为人知,还在其1906年接手惠兴女学校之后。时人已有明言:“佐领贵林接办惠兴女学,一跃而为学界中有数人物。”^②故讨论贵林在清末杭州以至浙江政局与社会上之影响,势必先从此说起。

惠兴与贵林一样,同为驻防营出身。其姓瓜尔佳氏,丈夫为镶蓝旗附生,早逝。^③1904年10月24日,已经认识到“现在的时势,正是变法改良的时候”的惠兴,毅然“以提倡女学自任”,在杭州旗营中创办了贞文女学校。还在8月7日召开筹备会之际,惠兴即以满人刚毅的性格,表达了“不成功,便成仁”的办学决心,当众割臂自誓曰:“今日为杭州旗城女学校成立之日,我以此血为纪念。如此校关闭,我必以身殉之。”^④而学校开办一年后,因为在满人群体中得不到有力支持,艰难支撑的惠兴家产荡尽,最后于1905年12月21日于家中服毒自尽。临死前,惠兴留下遗书八封,并有上浙江将军瑞兴的禀帖,希望以自己的死,为贞文女校换取官方拨付的常经费,也实践了其以身殉学的誓言。惠兴自杀后,其分别致以遗书、委托校务的两位旗人妇女均不肯接任,学校面临停顿。贵林及时施以援手,才使该校获得了生机。

贵林对新式学堂的热心,早在1897年受命承办旗营中的梅青书院、大力购置新学书报上^⑤已见一斑。其支持惠兴办学,先是推荐宋恕女儿宋昭到贞文女校任教,后又遵照惠兴遗嘱,将其请款禀帖转呈瑞兴,已可谓尽心尽力。尤其是在惠兴死后,贵林四处发送由他撰写的《杭州惠兴女士为兴女学殉身节略》,大力传扬惠兴为女学牺牲的事迹,其文不仅在《申报》得到刊载,并且感动了《北京女报》的主笔张毓书(字展云)。张氏一面在《北京女报》用白话倾心动情地演述惠兴故事,一

① 贵林《致宋燕生书》(1892年4月11日)中言及:“迨客春补缺晋见,至秋旋杭,患病颇重。正值介(石)、云(珊)二公来赴闾试,未能聚谈,深以为憾。”(《东瓊三先生集补编》,第272页)其中“云珊”为池志澂。

② 《看旗营第一人才》。

③ 有关惠兴的情况及办学经过,见笔者《晚清女学中的满汉矛盾——惠兴自杀事件解读》(《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》第八章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4年)。

④ 《惠兴女士为女学牺牲》,《申报》1905年12月30日。此文为贵林所写。

⑤ 参见前引孙宝瑄戊戌二月初五(1898年2月25日)日记。

面联络梆子戏著名演员田际云,及时编排出文明新戏《惠兴女士传》,于1906年3月29日开始在北京上演,此举借为贞文女学校募捐,而将兴办女学的思想普及到北方一般民众中。贵林也与之南北呼应,北京地区的大笔捐款保证了改名惠兴女学校的杭州旗营女校的再生,贵林也因其鼎力相助以及办学经验,被杭州驻防营公举承办该校,由瑞兴委派为总办。1907年5月,贵林进京,更直接参与了《惠兴女士传》的重演,在该戏临近尾声之处,张毓书邀请贵林登台,现身说法,报告观剧感想以及惠兴女校近况,使贵林的演说长才也得到了展示的机会。^①而其议论葛亮著名的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为“犹非上德者”,以为“当求死而已”,既令孙宝瑄“深叹服”^②,也足以概括其将惠兴开创的事业继承维护并发扬光大的实绩。由此使得贵林在新学界声名鹊起。

不过,贵林的此番作为也不乏讥之为沽名钓誉者,从其本人的自述已可理会。1908年5月,贵林“为女学界联团体、便交通起见”^③,创办了《惠兴女学报》,发刊词中即道及:

中权受官、学二界之委托,感惠兴氏之激刺,由保守主义希望造时主义,至于今日,将及三年矣。凡此三年之间,除担任本校职任外,而他校以及公益、社会诸务,均就一己精力之所及,竭诚经营,不遗余力。誉者以为热心,毁者以为钓誉。中权氏不知其他,求心之所安,期事之有济。率此以往,即至牺牲己身,亦所不顾,矧区区毁誉乎?^④

以此表明心迹,当然是信者自信,疑者仍疑。而贵林走出旗营,介入学界、商界、政界等各种社会群体的活动,其契机正在接办惠兴女学校,此段表白也提供了最有力的证言。

实际上,在旗营内部,贵林已努力推进多项改革。吴庆坻著《辛亥殉难记》称:“驻防营设学堂、办警察事并创举,独肩其劳。”^⑤可见其大略。此外,1908年3月,贵林还在旗营自治会内发起组织了阅报社宣讲所,“定每月宣讲一次”,擅长演讲的贵林也当仁不让。^⑥而依据《申报》的记述^⑦,1907年以后,贵林更频繁参与社会

① 参见笔者《旧戏台上的文明戏——田际云与北京“妇女匡学会”》,《现代中国》第5辑,武汉:湖北教育出版社,2004年。

② 孙宝瑄戊申十月八日(1908年11月1日)日记,《忘山庐日记》下册,第1260页。

③ 《本报广告》,《惠兴女学报》第1期,1908年5月。

④ 《〈惠兴女学报〉发刊辞》,《惠兴女学报》第1期。

⑤ 吴庆坻:《贵林传》,氏著《辛亥殉难记》卷四,第15页,1922年重印本。

⑥ 《旗营宣讲有期》,《杭州白话报》1908年4月14日。

⑦ 本文所采用的《申报》资料,在检索时得到了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博士生孙丽莹的帮助,特致谢忱。

事务,可考知者如下:

1907年9月22日,参加浙江教育总会成立大会。

1907年11月14日,作为旗营学校代表,参加浙江学校认股会。

1907年11月25日,参加全省国民拒款大会,当选为杭(州)乍(浦)驻防代表。

1907年12月2日,作为驻防代表,参与全浙十一府暨驻防、留学界拒款会代表谒见新任浙江巡抚冯汝霖的请愿活动。

1907年12月9日,参加浙江教育总会正式大会,被推举为调查员。

1908年1月15日,参加浙江禁烟调查社新总理莅任欢迎会,发表演说。

1908年2月25日,参加在凤林寺举行的安葬秋瑾祭奠会,发表演说。

1908年6月29日,参加禁烟调查社周年纪念会,以社董身份报告入会理由,并代发起人辩诬。

1908年12月19日,参加浙江农工研究会成立大会,当选为副会长。

1909年3月6日,参加浙江省农务总会成立大会,当选为协理。

1909年9月12日,参加全浙保路会特别会,被推举为驻防代表,即任临时干事。

1909年9月25日,参加浙江省救火联合会成立大会,被推举为临时议长,当选为副会长,以职繁辞。

1909年10月28日,以惠兴女学校校长身份,参加浙江教育总会举办的夏震武会长欢迎会。

1909年11月6日上午,参加全浙保路会及绅商学界为汤寿潜入甬举行的欢送大会;下午,参加浙江教育总会大会,当选为评议员。

1909年12月7日,参加全浙保路会举办的挽留汤寿潜、拒任江西提学使特别大会。

1910年1月2日,参加国民筹还国债大会,演说国民捐之历史。

1910年1月14日,以浙江省筹还国债会三位代表之一的身份,晋謁浙江巡抚增韞。

1910年1月23日,参加浙江省筹还国债会正式大会,被推举为学界八位代表之一,并发表演说。

1910年3月11日,参加杭嘉湖绍金衢严七府出品展览会开幕第一日活动,以来宾身份发表演说。

1910年3月20日,参加杭嘉湖绍等七府出品展览会开幕礼,以来宾身份发表演说。

1910年4月12日,担任浙江省第四次国会请愿代表选举大会主席,并作报告。

1910年7月24日,参加杭州商务总会邀集绅商学界讨论迁移日人商店后续问题之聚会,发言质询。

1910年9月9日,参加杭州士绅组织之浙路维持会会议,被推举为两名赴沪代表之一。

1910年9月10日,参加浙路维持会成立大会,发表意见。

1910年10月1日,担任全浙商会维持浙路大会主席,宣告意见。

1911年9月17日,参加浙江省水灾急赈会,发表意见。^①

以上列出的27次活动尽管并不齐全,仍可看出贵林之勇于任事,且职务繁多。最忙的时候,他甚至一日之间,上、下午分别参加不同的会议。与会的种类也五花八门,大致确如其所说,可归纳为“公益、社会诸务”。个别组织固有官方色彩,如禁烟调查社总理,“向举臬司及巡警总办充任”^②,贵林本人也曾以巡抚代理委员的官家身份出席1909年10月14日举行的浙江谘议局成立大会^③,然而,其间民间社团占了绝大多数,也一目了然。

所有各项事务中,贵林参与最多、表现也最为突出的是浙江拒款保路运动。根

① 参见《申报》所载《浙江教育总会成立》(1907年9月26日)、《浙江学校认股会纪事》(1907年11月18日)、《全浙国民拒款会纪事》(1907年11月29日)、《全浙代表进谒冯抚详纪》(1907年12月6日)、《全浙总教育会正式会记事》(1907年12月13日)、《禁烟调查社开欢迎会》(1908年1月17日)、《祭葬秋瑾女士详纪》(1908年2月29日)、《禁烟调查社纪念会记事》(1908年7月3日)、《农工研究大会纪事》(1908年12月23日)、《农务大会记事》(1909年3月10日)、《全浙保路大会记事》(1909年9月15日)、《救火联合会成立会纪事》(1909年9月28日)、《教育会欢迎会长纪闻》(1909年11月1日)、《浙江各团体欢送汤京卿入觐记事》(1909年11月9日)、《全浙教育总会尚武之气概》(1909年11月10日)、《保路会挽留汤总理特会纪事》(1909年12月10日)、《国民筹还国债大会记事》(1910年1月5日)、《浙绅为国民捐谒见增中丞纪事》(1910年1月18日)、《浙省筹还国债正式大会详情》(1910年1月27日)、《七府展览会开幕记事》(1910年3月14日)、《七府展览会正式开幕》(1910年3月23日)、《选举国会请愿代表记事》(1910年4月14日)、《杭垣日商迁移后二大问题》(1910年7月26日)、《杭垣官商对于路事之态度·杭商组织浙路维持会纪事》(1910年9月12日)、《浙路维持会开会纪事》(1910年9月11日)、《全浙商会维持浙路大会》(1910年10月4日)、《浙省水灾急赈会记要》(1911年9月19日)。

② 《禁烟调查社开欢迎会》。

③ 《浙江谘议局成立大会及选举》,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、浙江省图书馆编:《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》,第164页,杭州:浙江人民出版社,1981年。“巡抚代理委员”的名衔据该书第172页。

据朱福洗等浙路全体股东代表1910年撰写的《浙江铁路始末述略》^①记载,此一风潮起自1905年美商欲承办浙赣铁路,“浙人以保国权为念,群起力争”,于当年7月成立了商办全浙铁路公司,公举汤寿潜任总理,获得朝廷批准,由此开始民间的集款筑路。然而,早在1898年,清廷先已与英国银公司签订了包括苏杭甬(后改为沪杭甬)铁路在内的五条铁路修筑草约,英商据此要求正式签约,以借款的方式谋求控制路权。浙江全省由此兴起了国民拒款风潮,民众纷纷购买全浙铁路公司股票。清政府却不顾浙人反对,1908年3月仍与英商签订了《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》(对内称为《沪杭甬铁路存款章程》),借款150万镑。浙江商民的抗争焦点随之从拒款转向保路。而为破坏浙路的修建,1909年间,朝廷也不断以云南按察使、江西提学使的任命,试图将汤寿潜调离浙江。1910年8月,更将汤革职,不准其再干预路事。浙江绅商因此成立浙路维持会,要求留汤办路,运动也日益深化。

以此反观贵林的行迹,其大致参加了浙江拒款保路运动的全过程,而且屡屡建言,态度相当积极。最初在1907年11月14日由浙江铁路学校发起召开的省城各校认股会上,关于“研究交款方法”一项,贵林不赞成“五年交清”,而倾向以十年为期,理由是:“付款期长,清苦学生亦可认股;倘限期过短,诸多不便。”^②这是出于学生的实际承受能力而提出的合理建议,也有利于吸收更多的人参与其中。而在汤寿潜被革职后,贵林不但参加了1910年10月1日由全浙商务总会召集各分会分所“公谋维持办法”的大会,而且被一百多与会者公推为主席,主持了四条维持浙路方法的讨论与修订。其中最为关键的第三条,原拟为:“公同研究《公司律》进退商办总理权限,议决后,呈由抚宪分别奏咨。”经楼守光(醴安)、褚辅成(慧僧)提出:“今日之会由商会发生,当注重政府违背《商律》。似应联络全省,诘问商部。”“商会之设,责在保商。全浙实业仅此数百里之铁路稍有成效,而政府任情摧残,破坏《商律》,商人无所适从,商会形同虚设,竟可从此解散。现在惟有派员进京,要求商部尊重《商律·公司律》;要求无效,一律解散。”对此激烈主张,贵林也表示同意,并倡议“即日实行”,获得大众赞成,此条因此改为:“决派代表入都,呈请商部代奏,保存《商律》,俾达收回成命之目的。”其中所表达的指认政府革去汤寿潜浙铁公司总理之职为违法,从地方官代奏变为直接派代表进京,以示“持死力争”^③的决心,凡此,抗议清廷的指向均极为显明。

就个人姿态而言,贵林的主张可谓相当激进。1910年9月9日召开的浙路维

① 朱福洗等:《浙江铁路始末述略》,《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》,第224—228页。叙述中亦参考了陈志放所撰《汤寿潜年谱》(浙江省萧山市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编《汤寿潜史料专辑》[《萧山文史资料选辑》四],第621—635页,1993年)。

② 《浙江学校认股会纪事》。

③ 《全浙商会维持浙路大会》。

持会一开场,贵林即率先发言,提议:

此次政府咎汤,无端牵涉路事,破坏商办,违背先朝成宪,事关东南大局,危亡所系,凡属国民,万不能再安缄默。其办法应分为两团体:(一)为法定团体,如股东等应主和平;(二)为人民团体,不厌激烈。即日公电军机处、都察院、邮传部等声明:汤以言得罪,于路有功,力请代奏。颁布后命,解释谕旨界说,收回“不准干预路事”成命,以安东南人心。否则南洋劝业,招致华侨,亟亟提倡实业,概归无效。有血气者忿蹈东海,卑卑者竟隶外籍,朝鲜前车,庚子顺民,人心解体,国本大伤。

并在商讨最后办法“万一政府主持压力,人民呼吁概置不理,应再派人叩阍,并吁求台谏联合奏参,为再接再厉之举”时,“尤形忿激”,声言:“最后办法诸君即不赞成,鄙人必独行其是;即获严谴,为汤寿潜第二,或竟牺牲生命,亦在所不惜。”记者称其“语语血诚,会众为之动容”^①,当系写实。

贵林所述尽管言辞激切,但若仔细体察,还是可以分辨出其维护朝廷或曰国家大局的良苦用心。所谓“不厌激烈”,并非走向革命一途,而是就表达的形式立说,因“最后办法”已将赴京请命设定为最高级别的抗争手段。身处地方,贵林其实早已如杭州将军瑞兴一般,切实感知到“人情愤激,官力难遏,大有横决暴动之势”^②的统治危机。作为满人群体中的一员,又深受儒家忠孝观念熏陶,贵林此时只能期盼朝廷的改弦更张、顺从民意,以求消弭正在迅速积聚的革命情绪,是即“以安东南人心”之真意。故其“血诚”,实可自代表民意与为清廷着想两面言之。

参与拒款保路历次集会时,贵林多半被视为旗营的民意代表,不过,他所拥有的满营武官身份,仍潜在地发挥作用。如1907年12月2日全浙拒款会代表进见巡抚冯汝骥,“各代表排次入花厅”,而以“驻防贵翰香君居首”,以下顺序为留日代表、杭州等十一府代表、副会长王廷扬,“以次站立”等候。这一序列无疑凸显了贵林在众代表中的特殊地位。入座后,冯氏也先向贵林发问:“杭城女学堂有几所?”显然也对贵林的热心女学有所耳闻。而贵林亦率先将话头转向主题:“此次中丞到浙,百姓仰望久矣。浙路借款问题,全仗大公祖主持。”并称:“满营及各府近已集款至四千万余元,筑造全浙铁路,已绰绰有余,何待外债?”而对于拒款会的作用,也专从安定人心一面立说:“拒款会未设以前,省城人心恐慌,大有纷扰之势。自拒款会成立后,人心稍安。”^③这自然也是贵林积极参与保路运动、希望能够控制局势发展的一个出发点。

① 《杭垣官商对于路事之态度》。

② 《杭州将军瑞致外务部电》,《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》,第275页。

③ 《全浙代表进谒冯抚详纪》。

不过,贵林亦官亦民、处处争先的角色,既为其在一系列社会活动中赢得了声望,也招致了诸多不满。譬如1907年9月22日,浙江教育总会开成立大会,贵林谋求成为代表杭州府的唯一一名临时干事,以便对会长的选举拥有更大发言权,当场即“致各府来会者大哗”,并遭温州二人大力指斥。^①而关于1909年11月6日下午的会议报道,则被《申报》讥讽性地标题为《全浙教育总会尚武之气概》。所记会场中的煞尾动作,即贵林的发言,“归咎于从前会长(按:指项崧,温州瑞安人)之放弃,大发牢骚,骂詈多时,若以此尽到会之义务者然”,责备的语气已十分明显。尤其是在一个月后保路会召开的挽留汤寿潜大会上,贵林的举动更是令人侧目。因“三时四十分钟入席,默坐许久,尚无人登台报告”,以来宾身份临场的贵林便跃身而出,演出了如下一幕:

来宾贵翰香突然登台诘问:“今日会事究系何人主持?似此推诿,实属不成事体。”复又盛气演说汤京卿必不就职,可以无庸发电挽留之原因,并痛骂浙江绅士之凉血;语次,忽又牵涉国民捐,谓拟发起,凡现办公益之人,月薪在三十元以上者,月捐二成,集款开设国民银行。方在手舞足蹈、兴高采烈之际,商会业董王湘泉君愤甚,不俟其辞毕,突然登台谓:“贵君所说问题重大,与今日开会宗旨渺不相涉,可请另日再议。”即照秩序,请会众推举临时主席。当推定陈介石主政,为临时议长。贵赧颜退席,意兴索然。^②

若论贵林此次的越位发言,原本事出有因,但因其言辞过于得罪在场绅商,且表现欲太强烈,乃至反客为主、另设议题,不免被自认主人的商董抢白。而其对帮助政府偿还国债所举办的国民捐极为倾心,于此也尽显无遗。

然而,以贵林之说辞动听,无论官方主持还是民间社团的集会,仍然不时有会议主持人请其代为发言。如1908年12月19日,贵林受浙江农工商矿局总办、农工研究会监督汤汝和(字味梅)委任,“代表报告本会组织情形”;1909年11月6日,欢送汤寿潜大会临时主席陈黻宸又委托贵林“代表演说”等。^③诸如此类的代言,当然也有益于提高贵林的社会知名度。

总体而言,贵林在清末浙江新政中不乏可圈可点的精彩表现,于办女学、争路权、偿国债方面尤其突出。其立场大体接近立宪党人,不过,与本地汉族绅商更关注保路不同,贵林是以同样的热情参与维护路权和发起国民捐。前者包含了地方利益与国家权益两个层面的内涵,其兴起及迅速扩大蔓延的趋势直接与朝廷的旨意相冲突,亦令地方官感觉棘手;后者则因其为国分忧的单一性,而得到了当地各

① 《浙江教育总会成立》。

② 《保路会挽留汤总理特会纪事》。

③ 《农工研究大会纪事》《浙江各团体欢送汤京卿入觐记事》。

级官员的普遍支持^①。由此显示了贵林所持守的国家至上理念,以及在其意识中,朝廷与国家二者既可以分离^②,又具有相关性。分离是一种理性判断的结果,故对朝廷有不满以至抗议;合一则更多属于身为满人的情感认同,因而即使是最激烈的抗争,在贵林也是出于“爱国”的宗旨、“恨铁不成钢”的心意。此外,其不甘人后、能言善辩的突出个性,又引起不少人的反感。不排除贵林的争强好胜中有个人成名甚至揽权的成分,但其人之热心公益,即使厌恶、反对者也并不否认。毕竟性格问题是小节,政治诉求的相近为大义,以仗义执言姿态出现于公众场合的“旗营第一人才”^③贵林,也因此而立宪党人中获得了更多的赞誉与支持。

“我为满人”

晚清毕竟是一个民族主义思潮激荡的时代,满汉矛盾在此时期也再度凸显。与主张消融畛域的温和的改良一立宪派人士不同,革命派排满的宣传虽非主流,却具有强大的渗透性与潜在的影响力。而清廷自1906年起开始改革官制、预备立宪,整个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保留与迟疑,因明显偏向满人权益,也不能令汉族官绅满意、服气。处此情境,可想而知,作为满族地方精英的贵林,以其争强好胜的行事风格,自然会卷入这场权力冲突。

其实,贵林之为后人所知,多半是由于秋瑾。1908年2月25日,由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与徐自华(字寄尘)发起,在杭州凤林寺举行祭葬秋瑾仪式。事前,徐自华在上海《时报》曾刊登《会祭鉴湖公函(致学界同人)》,贵林则是在看到《杭州白话报》前一日的《女界义侠之可风》的通讯,知道葬礼的时间与地点后,方才赴会^④。依照贵林的性格,既与会,必发言,且往往越众而前,此次也不例外。在“先

① 与拒款、保路、维持各会的集会以绅商学界自主不同,杭州商界发起筹还国债、创办国民捐的集会,则有包括巡警道、仁和与钱塘二县县令等官场人物的出席(《国民筹还国债大会记事》);浙江巡抚增韫也对筹还国债会代表表示,“本部院亦国民之一分子,对于此举,当略巡抚之官阶,而尽国民之义务,竭力提倡”(《浙绅为国民捐谒见增中丞纪事》)。

② 梁启超著《新史学》,已批评中国旧史学“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”(《中国之旧史学》,《新民丛报》第1号,1902年2月)。

③ 此为1910年新任浙江将军的志锐对贵林的评价:“近新将军到浙,颇讲人才。日前往观惠兴学校,大加奖许,并云旗营人才以贵为第一。”《民立报》1910年12月3日的相关报道题为《看旗营第一人才》。

④ 贵林《志会祭秋瑾女士事》(《惠兴女学报》第1期,1908年5月)文中“节录中权氏演说”,开头便提及:“兄弟阅《白话报》,知吴芝瑛女士为秋女士筑坟事。”查《杭州白话报》,1908年2月23日刊《女界义侠之可风》,预告:“定本月二十四日(按:即西历2月25日)行社祭礼,假凤林寺为会所,午后一点钟开会,四点钟散会。男女学界同胞听见吴、徐两女士有这样义侠,必大家起敬起愧,届时赴会的人必不少呢。”